政治科學論叢／第 64 期／民國 104 年 6 月／頁 45-84

鼓勵外資政策與國家間衝突之分析（1970-2001）*

邱奕宏**

摘　要

鼓勵外來直接投資政策是否隱含國家不願意運用武力來解決國家間衝突的意涵？本文之目的在檢驗國家的提倡外資政策與其主動開啓軍事衝突間的關聯。透過檢視國家的意向，本文認爲鼓勵外資政策隱含國家傾向和平的意涵，這是由於下列兩點因素：首先、一國的鼓勵外資政策與其主動開啓軍事衝突無法相容，因爲後者將對國家吸引外資的作爲帶來負面影響。其次，鼓勵外資政策通常標誌著國家對跨國企業之較爲可信的承諾，以維繫和平的環境。由此，採行鼓勵外資政策的國家較少會主動開啓軍事衝突。本研究透過 1970 年至 2001 年期間的統計資料，分析鼓勵外資政策與國家開啓衝突間的關聯。研究結果顯示，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與國家發動衝突有統計顯著性的負面相關。換言之，提倡外資政策具有減少國家主動開啓軍事衝突的促和效果，亦可知鼓勵外資政策隱含國家具有較低衝突意願的傾向。

關鍵詞：鼓勵外資政策、國家間軍事衝突、外來直接投資、衝突開啓

* DOI:10.6166/TJPS.64(45-84)。
**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其專長爲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經濟學；E-mail: chiouyihung@nctu.edu.tw。
收稿日期：104 年 1 月 14 日；通過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鼓勵外來直接投資政策（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motion policy, pro-FDI policy，簡稱鼓勵外資政策）是否隱含國家具較低衝突意願的傾向，[1] 這是一項廣爲關注但尚未獲得解答，而在當今全球經濟高度互賴下成爲值得深入探索的議題。當前國際關係學界對於跨國經濟活動對國家間衝突之促進和平影響（簡稱促和影響）大多僅聚焦於跨國貿易與國家間衝突的關聯，[2] 且大多關注於事實面（de facto）之經濟因素的分析（Russett and Oneal, 2001；Barbieri, 2002；Reuveny and Kang, 1998），僅有少數的研究將焦點轉向到其他形式的跨國經濟活動對於國際衝突的影響（Rosecrance and Thompson, 2003；Polachek and Seiglie, 2005；Polachek et al., 2007）。此外，僅有極少數的研究是從法律面（de jure），也即是政策的面向來分析經濟因素對國家間衝突的政治影響。[3]

儘管目前國際關係學界對國際貿易活動與跨國衝突的關聯已進行許多廣泛且深入的研究（Oneal et al., 1996；Oneal and Russett, 1997；1999），

1　鼓勵外來直接投資政策，即是指政府透過制訂相關政策，透過改善總體投資環境或提供相關優惠的商業誘因，以吸引跨國企業來本國進行直接投資，其詳細內涵將於本文第二部分進行探討。另外，所謂外來直接投資（FDI），根據聯合國定義，意指「一項牽涉長期關係與反映由一個經濟體的住民實體（residence entity）（外來直接投資者或母公司）對另一個非外來直接投資者母國之經濟體的企業實體有著持續的利益及控制。」（UNCTAD, 2007）。換言之，鼓勵外來直接投資政策係指鼓勵來自國外到本國從事直接投資的相關政策，而不涉及如在本國股票證券市場進行短期投機性行爲的間接投資，或稱爲證券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的行爲。本文所指涉之外來投資或外資，皆是指外來直接投資（FDI），而與間接投資無關。

2　本文的國家間衝突意指主權國家間的軍事化衝突（militarized conflict），亦指相關國家以軍事武力手段作爲國家間糾紛或爭端的解決方式。本文的跨國衝突、國際衝突等相關詞彙皆是交替運用來指涉國家間的軍事化衝突。參見本文第三部分第一項說明。

3　有關事實面與法律面的區別，在於前者著重在既存的事實與實質，但後者則指涉法律或規定的陳述。在本文而言，事實面觀點的分析指涉相關研究聚焦於將經濟活動之實際數量或價值的影響（如：出口量加進口量、或外來直接投資流入的數量）。法律面的分析則關注於政府如何利用法律工具，如法律、規定、官方政策等，來規範經濟活動的相關研究（例如戰略貿易政策、或保護主義等）。

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但是學界對當前國家間競相制訂鼓勵外資政策以爭取外資的競賽，是否對國家間的軍事行爲產生影響，則尚未進行探討。本文採取國際關係學者 Most 與 Starr 所提出的「機會與意願之分析架構」（opportunity and willingness framework）（Most and Starr, 1989）作爲出發點，以區別於先前的研究大多僅從「機會」的角度進行探討。本文主張，制訂提倡外資政策以吸引外資流入的國家，在國家間爭端中有較低的可能來採取軍事手段主動發動衝突。[4] 這是因爲採取鼓勵外資政策的國家，即已透露其原本即「無意」（unwillingness）採取攻擊性的軍事手段作爲國家間爭端的解決之道。

這是因爲鼓勵外資政策隱含下列意義：首先、此政策可被視爲是該國轉移其國家優先順序的指標；[5] 其次、此政策隱含該國對於如何創造財富以謀求國家發展，出現不同於以往的思考；第三、該政策也涉及對當前國際社會各國激烈競爭所衍生之新規範的深思熟慮之回應。這些因素使得鼓勵外資政策與國家間衝突的關聯值得更進一步探討，以下就上述三點分別深入剖析。

第一，在過去數十年來，國際關係學者普遍認爲國家間競爭的邏輯與本質，較以往已出現顯著的改變（Rosecrance, 1986；Singer and Wildavsky, 1996）。當前的主權國家變得較少透過領土的兼併與武力的征服來追求其國家的財富擴大。[6] 相反地，越趨普遍的趨勢是，國家間的競賽是經由「在他們自身的領土內創造財富的手段，甚於尋求利用權力來獲得更多領土」（Stopford and Strange, 1991: 1）。

與此趨勢相呼應的是，自 1980 年代初以來，國家間競相利用獎勵外資政策以吸引外資的政策競爭已然成爲一個全球的現象。各國競相爭取外資進駐的全球競爭之白熱化現象，從許多國家紛紛採取低稅負及提供各項優

4 筆者將於第三部分針對國家間爭端、國家間衝突及相關詞彙的涵義與區別做更詳細的說明。

5 例如，1967 年的印尼、1970 年代中期的智利、1979 年的中國、1987 年的越南，皆在該國國內政治發生重大的變革後，在其外資政策上也出現的重大的變化（Baer and Miles, 2001；Freeman, 2002；Naughton, 2007；Robison, 1986）。

6 雖然在 2014 年發生的俄羅斯兼併原屬於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可能是例外，但是許多分析指出，俄羅斯此一兼併的經濟代價恐怕是比其獲得的利益更爲巨大且昂貴（Bovt, 2014；Kelly and Mason, 20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惠措施來吸引外資的熱潮即可見一斑。此一爭取外資的全球競賽之現象被稱爲是「全球競價戰爭」或是「競相削價比賽」（race to the bottom）（Oman, 2000；Oxelheim, 1993）。

儘管現今許多研究對外資政策的成效與外資相關的議題，已進行諸多正反雙方的激烈辯論，[7] 然而，目前學界仍未曾對此盛行於國家間的吸引外資政策之競爭，對國際衝突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探討，亦未曾針對此一競爭是否會對一國在國家間爭端中，影響其使用武力手段的決定進行分析。

倘若前述之鼓勵外資政策的趨勢意味著國家已逐漸將運用軍事手段的武力征服，視爲是該國在創造財富與繁榮時一項較不具效益的政策工具，在其他因素不變的前提下，該國會受到經濟利益的驅使而來向外發動軍事侵略的可能性，則會相對地降低。[8] 倘若和平的手段，例如國際貿易、科技創新、外來投資等，被該國視爲是促進經濟成長與達成國家利益之較有效的政策工具，則該國的決策者會更有意願來運用此類和平的手段以達成其目的，而較不願意採取軍事侵略的行爲。這是因爲後者通常代價高昂且結果是不確定的（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1992）。

儘管如此，目前國關學界對於商業與衝突關係的研究，大多將經濟因素對國家間衝突的和平影響歸因於「機會成本」的考量，認爲倘若國家能透過跨國經濟活動而獲得可觀的利益，則在擔憂軍事衝突對經濟層面所可能引發之巨大負面後果的考量下，反而會使得國家不願意貿然採取軍事行動（Brooks, 1999；2005；Gartzke, 2003；Rosecrance, 1986）。

然而，這些研究忽略的另一種解釋，也即是國家可能透過其外資政策的調整，在允許跨國企業到其領域內進行投資的同時，亦即透露該國在主觀上具有低度衝突意願的傾向。這是因爲一國外資政策的轉變，意味著該國願意接受歡迎外資所可能帶來的風險，且願意採取參與及融入全球經濟

7　舉例而言，經濟學家對外資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即有不同的意見（Moran, 1999；Firebaugh, 1992；London and Williams, 1988；de Soysa, 2003；Kosack and Tobin, 2006）；其他學者則針對外資對於維護人權表現的效果亦有所爭議（Blanton and Blanton, 2007；Apodaca, 2002）。

8　在權力不平衡的前提下，權力較大的國家侵略權力較小的國家通常而言是划算的，參見 Liberman (1996) 的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作法。這些國家「體認到透過世界市場來獲得需要的貨品與服務，會使得他們內部的經濟發展更好，而不是透過向外征服與兼併大塊的土地」（Rosecrance, 1986: 24-25）。[9]

此外，相較於傳統上從事實面的角度，認爲國家的外資依賴對於國家間衝突中具有促和影響的看法，[10] 筆者認爲從法律面觀點的外資因素，也即是各種的鼓勵外資政策則更可能與具有較低發動衝突意願的國家有著更緊密的聯繫。這是因爲此類政策可能隱含著該國具有維持和平的環境以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觀意願。[11] 筆者認爲此論點可透由一系列根基於國家「單元層次」（monadic level）的假設來檢證。[12] 因此，本文的假設主張：提出各種鼓勵外資政策以吸引外資進入的國家，渠較不可能在國家間爭端中率先運用軍事手段而引發衝突。本文的實證研究係探討外資因素與一國主動使用軍事手段而導致國家間衝突兩者間的關係，研究涵蓋期間爲 1970 年至 2001 年。[13]

本文內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將釐清各種形式的鼓勵外資政策，及其與國家軍事行爲之關聯的理論分析，進以說明鼓勵外資政策與衝突開啓（conflict initiation）在理論上的連結性。[14] 其次，基於前述理論連結的假設，本文主張一國制訂鼓勵外資政策與衝突開啓在本質上是無法相容的。

---

9 原文如下：“recognize that they can do better through inter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ustained by a worldwide market for their goods and services than by trying to conquer and assimilate large tracts of land.”

10 外資依賴意指一國的經濟中仰賴外來直接投資的比重，通常以一國在特定年度中其吸引的外資總量占其 GDP 的比重來評估。該比重越高，表示該國經濟越依賴外資流入。參見第四部份說明。

11 例如，自從中國在 1979 年採取開放政策後，此種非衝突的論調即經常出現在中國官方的外交聲明中。

12 在國際衝突的研究中，學者通常將國家間衝突視爲是一個成對國家（dyad）的現象，也即是至少要兩個國家才會引發國家間的衝突，因此學者多從成對國家層次的角度進行分析。然而，國家單元層次的角度則在檢視一國總體的特徵，且此特徵不會因對象國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因此適合本文的分析。下文有更詳細的說明。

13 本文的涵蓋期間，主要受限於各變項資料的來源不同，有些變項資料庫尚未更新到最近的年份。

14 所謂衝突開啓意謂一國在國家間爭端中率先主動運用軍事手段而引發國家間軍事衝突。見下文第三部份第一項說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後，筆者說明相關變項的操作性定義、統計資料來源與進行此實證研究的操作方法，之後再進行統計分析並闡釋其統計結果。結論部分將總結本文的重要發現、理論貢獻及政策意涵。

貳、鼓勵外資政策之全球競爭的興起

過去數十年來，全球經濟出現一項引發關注的現象，即越來越多的國家競相爭取外資挹注以促進其經濟發展。從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市場自由化、解除管制及私有化的經濟風潮席捲全球，並躍之成爲國際經濟政策的主流思潮（Yergin and Stanislaw, 2002）。這一波經濟政策思潮的巨幅轉變，不僅導致國際貿易的巨幅成長及跨國資本流通的急速增加，亦使得在已開發與發展中國家的各國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紛紛致力於制訂各項優惠政策以吸引外來直接投資，進以創造就業機會及促進經濟成長（Oman, 2000；UNCTAD, 2003）。

例如在 1990 年代，許多國家紛紛採取積極的作法來吸引外資的進駐。據估計，實施鼓勵外資政策的發展中國家數量，從 1991 年的 58 個增加一倍到 1999 年的 116 個國家（Moran, 1999）。根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委員會（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的研究指出，在國家層級的鼓勵投資機構（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ies, IPAs）之數量在 2003 年已超過 160 個（UNCTAD, 2003），倘若將地方層級的鼓勵投資機構（subnational IPAs）的數量亦納入計算，則此官方設置的鼓勵外資機構之總數已然超過 400 個。

隨著國家間在鼓勵外資政策上的競爭愈趨白熱化，許多人擔心此一項爭取外資競賽的負面影響將導致在國家間發生爭奪外資的割喉戰，並進而削弱地主國政府維護其本地勞工權益與保護其環境的意願（Korten, 2001；Saari, 1999）；但其他學者則抱持樂觀看法，認爲此一競爭將促使政治領袖更願意致力於提升本國的政治與經濟穩定、增加該國在基礎建設與人力資本的公共支出，以增進其經濟發展的前景，而有利於改善其經濟的基本面（Williamson, 1990；Yergin and Stanislaw, 2002）。

換言之，此派學者認爲，吸引外資的政策競爭將對地主國帶來正面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影響，且該政策競賽對開發中經濟體與轉型經濟體（transition economies）[15] 產生之良性效果的重要性已獲得聯合國的承認與肯定（UNCTAD, 1996）。然而，該政策競賽對國家在對外採取軍事行爲的意涵與影響，卻仍遭忽略而未被討論。本文之目的，即在探討鼓勵外資政策與國家是否主動開啓衝突之兩者間尚未被探究的失落聯結。

根據 Oman 的分析，全球競逐外資的鼓勵外資政策競賽基本上分爲兩大類型。首先是基於經濟誘因爲基礎（incentives-based）的外資政策競賽；其次是基於法規爲基礎（rules-based）的外資政策競賽。第一種類型的外資政策競賽包括提供財政與金融誘因。前者包括如營業稅的減免、免稅假期等，後者則是包括直接補貼、優惠貸款及借貸保證等。

至於第二種類型的競賽，意指「一組廣泛且十分異質性的政府政策，包括從對勞工權利或環境保護的規則改變，或對於既有法規的落實程度，以至到與鄰近國家簽訂區域整合協定，進以作爲吸引外資的工具」（Oman, 2000: 21）。換言之，一國政府採行的相關政策工具，諸如「對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強化法治與改善司法體系；建立出口加工區、或特別經濟區，而有著不同於本國其他地區的法規；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解除市場管制；或貿易與投資政策的自由化」（Oman, 2000: 21），皆可被包含在此類的外資政策競賽中。

因此，以法規爲基礎的競賽，與政府規定的實質改變、法律執行的改善及總體經濟環境的自由化有著密切的相關。由於此類型的政策競賽是以法規爲基礎，且多屬總體層面，因此筆者在撰寫本文後半之研究操作時，將對此類政策工具更細分爲兩類。另一方面，儘管以經濟誘因爲基礎的獎勵外資政策亦相當重要，但囿於目前缺乏此類相關的跨國資料，因此，筆者在現階段的研究焦點將鎖定在以法規爲基礎的外資政策，及其對於國家衝突開啓的影響。

基於前述的分析，本文將法規爲基礎的外資政策細分爲「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treaty-pro-FDI policy）及「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macro-pro-FDI policy）。前者包含「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s）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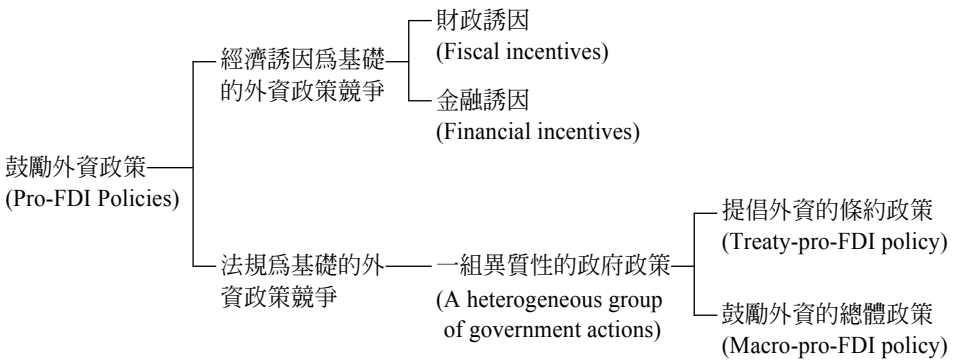
[15] 根據聯合國的分類，轉型經濟體指的俄羅斯與大多數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避免雙重課稅協定」（double taxation treaties, DTTs）。目前此兩種條約廣泛被視爲是以法律爲基礎之吸引外資的重要政策工具，並被國家廣泛採用以鼓勵及保護在締約國家間流動的外資。由於此兩種政策工具皆是以法律條約爲基礎。因此，這些條約可被視爲是締約國間在鼓勵外資政策上之具有相當可信度的指標（UNCTAD, 2003）。

此外，至於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方面，爲呈現此類政策異質性與總體層面的特性，筆者運用不同的指標以評估地主國政府所採行之各種面向的政策措施。本文在此方面所關注的焦點主要鎖定經濟與金融的自由化程度、財產權的保護及法治。這是由於這些層面之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對於跨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決定具有重要的影響。簡言之，筆者將 Oman 對於鼓勵外資政策的分類與本文涵蓋的分類以圖 1 呈現。

圖 1　鼓勵外資政策的分類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參、國家間衝突與鼓勵外資政策的理論關聯

下文將先就國家間衝突與相關的國家間爭端等概念進行釐清，其次，再將焦點轉移至兩項理論層面的解釋，闡明爲何鼓勵外資政策與具有較低主動發動衝突意向的國家，兩者間可能具有的理論關聯，進以此理論論述爲基礎，提出相對應的假設作爲後續分析檢證的基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國家間衝突與衝突開啓之概念的釐清

在說明國家間衝突的概念之前，筆者先闡明何謂國家間爭端。所謂國家間爭端，係指主權國家間因各種事件所導致利益的不相容性而產生的糾紛。倘若一國採取軍事手段的方式來解決此類國家間爭端，則將把此爭端轉變爲「國家間軍事化爭端」（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MIDs）。

根據學者 Jones (1996: 163) 提出的定義，「國家間軍事化爭端係指一串連結的歷史事件，在這些事件中有其中一國清楚地針對另一國政府、官方代表、官方武力、財產或領土，運用威脅、施展威脅或使用軍事武力。爭端係指這些事件的密度包含從威脅到使用武力，及到確實戰鬥而未達戰爭的事件。」換言之，從使用軍事手段進行威脅到眞正使用武力及進行戰鬥，皆是所謂國家間軍事化爭端的範圍，而使用軍事手段與否，則成爲國家間爭端是否會升高爲國家間軍事化爭端的關鍵。

本文所謂之國家間衝突，係指至少在兩個主權國家間在某些議題上有著無法相容的立場，因一國使用軍事武力而導致與另一國發生武裝衝突。因此，在本文所指涉的範圍內，國家間軍事化爭端是國家間衝突的前提，國家間衝突則是國家間軍事化爭端下由於一國武力的使用而導致與另一國爆發武裝衝突的事件。由此可知，本文指涉的國家間衝突之概念，重點不在於國家間之所以發生摩擦或衝突的原因（不論是因領土爭議、漁權衝突或貿易糾紛等），而是此類摩擦是否導致相關爭端國家採取軍事行動，進而爆發武裝衝突之實然面的現象。

倘若一國若在國家間軍事化爭端中，率先且主動地對相關當事國採取軍事行動，並引發國家間武裝的軍事衝突，則該國即成爲本文所謂之「衝突開啓者」（conflict initiator），而其行爲即構成本文所稱之「衝突開啓」的概念。

二、鼓勵外資政策與衝突開啓的不相容性

本質上，國家採取鼓勵外資政策與促進外資的流入，是爲達成國家多重的經濟目標，諸如創造就業、吸收新技術、行銷網絡、管理技術、提升國際競爭力、刺激經濟成長等（UNCTAD, 1992）。達成這些目標的方式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要是依賴和平的手段（例如：鼓勵投資政策）與非暴力的環境（例如：對投資者友善的經商環境），進以促進外資的流入與跨國企業的進駐。

然而，倘若該國在國家間爭端中決定運用武力作爲爭端解決的手段，則將破壞前述兩項條件。細言之，國家運用武力的後果將造成國家間衝突，此結果不僅將對該國商業運作及經濟環境造成負面影響，軍事衝突開始後所引發的相關經濟後果，亦將對於該國投注於吸引外資進入的努力造成嚴重的負面衝擊。由於跨國企業大多視戰爭與軍事衝突的發生是一國具高度政治風險的重要指標。因此，衝突的發生勢必將對衝突開啓國的外資流入造成負面影響（Political Risk Services, 2000；Kobrin, 1982；Kennedy, 1987；邱奕宏，2013）。

假設衝突開啓的後果是嚇跑跨國企業與導致外資流入的減少，倘若一國致力於制訂鼓勵外資政策來吸引外資，但卻同時運用武力來解決爭端而導致與其他國家的軍事衝突，此兩者無異是在邏輯上相互矛盾，且在實際成效上相互抵銷。截至目前爲止，無證據指出外資地主國的對外軍事行爲會有助於吸引外資的流入。然而，該國致力於營造友善之投資環境的政策努力，卻必然因爲其決意對外運用武力作爲的決定而化爲烏有。

從跨國企業的觀點，軍事衝突事件必然立即導致該投資地主國的政治風險升高。再者，國家間衝突的發生亦將對外國投資者造成不利的影響，包含直接的衝擊，例如軍事衝突將導致生產設施及基礎建設的破壞、人員的損傷、運輸與通訊設施的破壞，及間接的衝擊，例如是軍事衝突導致運輸、保險與生產成本的提高、或外國訂單的下滑等。

倘若國家間衝突持續升級，地主國則可能採取相關的緊急政策，例如戒嚴法、宵禁、及經濟管制等措施。此緊張情勢的升高將對跨國企業在地主國的商業營運造成嚴重的影響與干擾。更重要的，國家間軍事衝突的後果亦可能引發政治情勢的動盪，或甚至導致經濟政策的重大轉變及反外資政策的興起等等。[16] 因此，鼓勵外資政策與衝突開啓兩者是在本質上無法相容，這是由於國家的軍事行爲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將徹底抵消該國促進外

[16] 1959 年的古巴革命與 1979 年的伊朗革命皆曾對西方的跨國企業造成巨大的損害。這是因爲這些新上台的地主國政府採取反西方的立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資流入的政策，從而使該國吸引外資的努力成爲徒勞。

三、在軍事衝突陰影下的國家承諾的可信度

除了鼓勵外資政策與衝突開啓是在本質上無法並存外，另一項原因則是鼓勵外資政策通常代表該國可信的承諾，而此承諾稍有不慎即可能因軍事衝突的爆發而毀於一旦。倘若一國眞正有意爭取外資的進入，該國在發生國家間爭端的情況下必定會極不願意訴諸於武力手段的使用，這是由於下列兩點原因：

首先，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多是以法律爲基礎的條款，反映該國對改進其投資條件的具體承諾與政治努力。舉例而言，例如雙邊投資條約或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皆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雙邊協定，清楚地規範國民待遇的適用、法律保障的賠償及對於跨國企業的爭端解決之管道等（UNCTAD, 1996; 2003）。

此外，以經濟誘因爲基礎的獎勵外資政策，例如免稅假期或補貼等，亦是以法律條文爲形式所作出的規範，透過如契約保障、法律協議及政府規定等條款來明確規定對跨國企業所給予的優惠待遇。因此，這些政策可被視爲是政府在促進一個友善的投資環境所作出的可信承諾。

前述的討論點出了國家在制訂鼓勵外資政策之可信度的邏輯，然而，國際企業學者 Vernon 提出的「過時議價」模型（obsolescing bargaining model）卻指出地主國政府在跨國企業完成其投資後，有動機不履行對先前給予跨國企業的承諾（Vernon, 1971）。儘管 Vernon 正確地指出，具有後視觀點（ex post）優勢的地主國政府相較於具備前視（ex ante）考量的跨國企業，處於優勢的位置，而可以在跨國企業完成投資後，拒絕兌現其先前給予跨國企業的優惠承諾。

然而，此一論點並未減損本文提出的主張，也即是一個企圖透過作出可信承諾來致力吸引外資的國家，有較低的可能會主動引發衝突，這是基於下列三項原因：首先、一國的鼓勵外資政策通常是個持續的過程，而不是一次性。其次、開啓衝突將對吸引外資產生反效果，除嚇跑潛在的投資者外，該作爲不僅將抵消該國已經付出之吸引外資的努力，也將降低既有在該國營運的跨國企業繼續投資的意願。最後，地主國政府違背其與跨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企業之約定的可能性，較常會發生在經濟誘因（incentives-based）爲基礎之提倡外資政策的類別中，而較不會發生在以法規爲基礎（ruled-based）的鼓勵外資政策之項目中。

舉例而言，由於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具有雙邊及互惠的特性，倘若一國無法充分履行其在條約下的責任，此將引發另一締約國的不滿及報復。因此，可以預期在這種雙邊條約規範下，締約國將較不會出現違反條約規定的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一國簽署許多鼓勵外資的相關條約，並隱含透露其致力於發展經濟與尋求和平環境的傾向，但是否該國會確實採取行動來履行這些條約的責任與義務，則不無疑問。不容否認，有時這些條約締約國僅是盡口頭之惠，卻未付出眞正履行條約所需的努力。如同一些研究指出，許多國家在其簽署的雙邊優惠貿易條約（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TAs）中，包含對人權保障規定的遵守，但實際上卻未曾致力於履行這些條款，而使之成爲具文（Hafner-Burton, 2005）。因此，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對於衝突開啓的促和效果，仍須考慮到一國對這些條約的履行程度，而非僅從鼓勵外資條約的簽訂來進行判斷。

再者，由於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之特質與外資地主國的制度性改革或總體經濟政策的調整較爲相關，此類型的鼓勵外資政策可說是象徵國家對追求經濟繁榮之目標所發出之可信的承諾與訊號。爲落實此類型之提倡外資政策的目標，政治領袖不僅須致力於投注大量的政治資本以實踐全面性的制度性轉型（Haggard and Kaufman, 1995），且必須持續付出努力以確保改革的成功。

因此，相較於提供短期或對特定類型企業提供優惠經濟誘因的提倡外資政策，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則試圖給予跨國企業對地主國經濟前景更爲長期、廣泛及前瞻的願景。有鑑於此類型的鼓勵外資政策通常需要政府付出更多的努力與政治決心，且其後續發展通常會對該國造成更爲深遠的影響。因此，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可被視爲是一國政府，爲展現其政治決心而致力於營造一個對投資者友善之環境所發出的一個更爲可信的訊號。

相反地，有意透過軍事手段來解決國家間衝突的國家，則需要政府投入足夠的人力與資源來進行軍事準備，以極大化其獲取勝利的機會。在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情況下，國家資源則需從原本促進經濟的發展，轉移到軍事費用的支出。此一資源移轉將可能導致經濟成長的趨緩與國民所得的下滑。[17] 有鑑於引發軍事衝突的後果不僅將弱化地主國落實其提倡外資承諾的意願，亦將減損該國履踐其對跨國企業之承諾的能力。因此，有心致力於吸引外資的政治領袖將不願運用軍事手段挑起與他國的武裝衝突，特別是在其致力於吸引外資的時期。

肆、外資政策與衝突開啓的檢證假設

前述的討論主要是從法律面的觀點探討鼓勵外資政策與開啓衝突的理論關聯。另一方面，從事實面的觀點來看，相關的外資因素，如國家對外資依賴的程度，也將對一國是否主動發動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現今既有的研究認爲機會成本的考量，會對一國是否在國家間爭端中採取侵略性作爲，有著拘束的作用（Polachek and Xiang, 2010；Baldwin, 1980；Rosecrance, 1986）。此論點認爲，倘若一國依賴外資流入來提振其經濟發展，則該國將會對是否使用武力一事更爲謹慎，這是因爲擔心使用武力可能產生嚇跑投資者與造成經濟動盪的負面影響（Polachek et al., 2007）。因此，根據機會成本的論點，我們可預期國家對外資的依賴程度將與其開啓衝突的可能性呈現負相關，也即是一國有越高的外資依賴，該國將越不可能主動開啓衝突。

如同先前所述，法律面的外資因素也可能與該國開啓衝突的機率呈負相關。在這些鼓勵外資政策的各種面向中，本文主張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相較於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對一國是否會主動使用軍事武力來開啓衝突，具有更明顯的促和效果，這是基於下列幾點原因：首先，由於地主國政府對於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所須付出的政治努力，通常高於提倡外資

[17] 軍事支出的驟然增加，將導致一國原先經濟結構與資源配置因軍事支出的增加而發生扭曲，儘管在短期可能因爲軍事相關產業的需求大增，而產生一時的榮景，但長期而言勢必對其經濟成長產生負面的影響。實例如史達林時期的蘇聯及其他共產國家早期的經驗。

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高等教育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條約政策。因此鼓勵外資之總體政策所產生的促和效果，將較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有更爲顯著的效果。其次，考慮到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之後續的落實程度可能出現差異，但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通常反映了該國全面制度與總體經濟之變革的特質，而發出更爲可信的訊號，並透露出該國無意運用軍事武力來向外侵略。

此外，法律面的鼓勵外資政策與一國是否在國家間爭端中採取武力的關係，可從表 1 矩陣中的 (A)～(D) 四種情境來呈現。本文的假設是倘若一國制訂鼓勵外資政策，則其有較低的可能會在國家間爭端中主動使用武力引發衝突。因此，如前述推論能夠成立，情境 (A) 發生的機率將較低，而情境 (B) 發生的機率較高。情境 (C) 與 (D) 雖也被包含在本文的分析中，但並非本文關切的焦點，因爲這些情境無法得知鼓勵外資政策是否對該國在國家間爭端中使用武力具有抑制的影響。[18]

表 1　鼓勵外資政策與衝突開啓的四種可能情境[19]

本文的假設		一國是否制訂鼓勵外資政策	
		Yes	No
一國是否於國家間爭端中主動使用武力	Yes	(A)制訂鼓勵外資政策，但該國主動使用武力	(C)未制訂鼓勵外資政策，但該國在國家間爭端中主動使用武力
	No	(B)制訂鼓勵外資政策，該國未在對外關係中主動使用武力	(D)未制訂鼓勵外資政策，該國也未在對外關係中主動使用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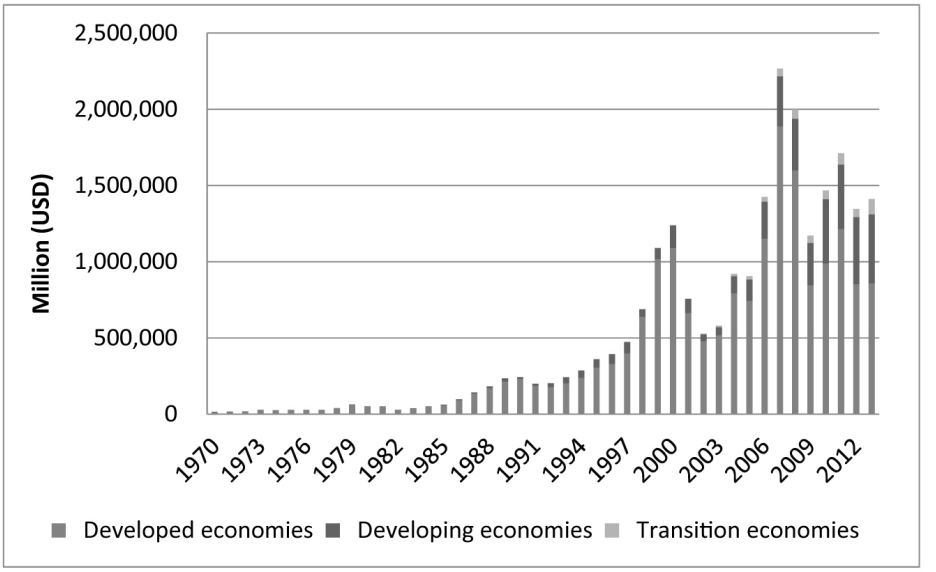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18] 依本文的論述，筆者或可推論，情境 (C) 之未制訂鼓勵外資政策的國家或許將更肆無忌憚而有較高可能在國家間爭端中率先使用武力。情境 (D) 則是屬於在現世的國際社會中有些國家，既未積極制訂鼓勵外資政策來吸引外資（無論是無意願或無能力），亦鮮少在對外關係中主動使用武力的國家類型，例如瑞典、瑞士、尼泊爾、不丹等。本文的統計樣本涵蓋上述四種情境，而統計分析亦將此四種情境包含在內。

[19] 筆者感謝評審委員的寶貴建議，使本文假設能更具體呈現出外資政策與衝突開啓兩者互動的可能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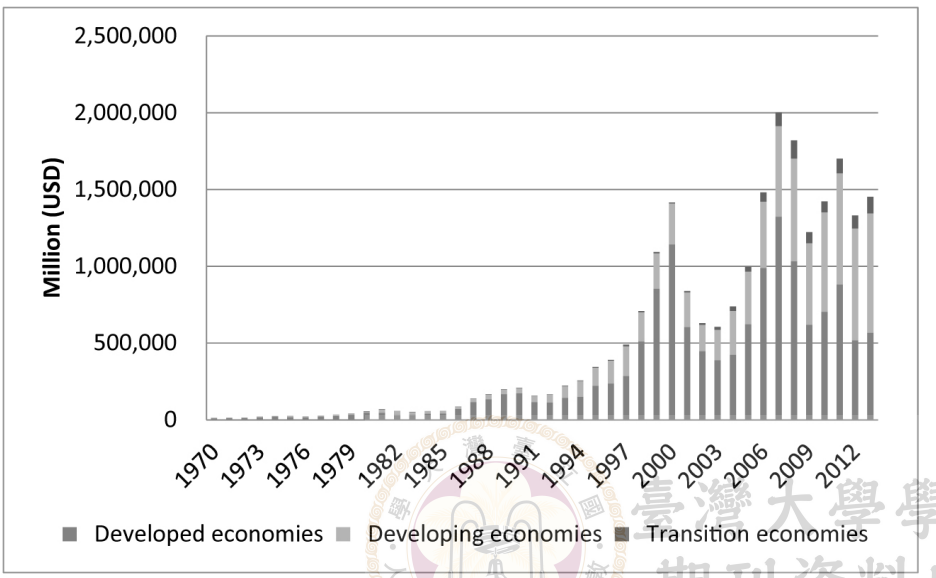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　全球外來投資的流出分佈（1970-2013）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 UNCTAD 統計資料庫網站的資料繪製（UNCTADSTAT, 2014）

圖 3　全球外來投資的流入分佈（1970-2013）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 UNCTAD 統計資料庫網站的資料繪製（UNCTADSTAT, 20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後，從實際上全球外資的流出與流入的分佈進行觀察，如同圖 2 及圖 3 所示，已開發國家是外資流動最主要的來源國與流入國。[20] 因此，本文主張外資因素的促和影響將會在不同類型的國家間有所差別。已開發國家作爲大多數當代外資與跨國企業的母國，原本即享有吸引外資的原生優勢（Jones, 1996；Dicken, 2003）。相對而言，發展中國家則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來爭取外資的流入（Moran, 2002；2006）。因此，本文主張鼓勵外資政策對開啓衝突的促和影響，將在開發中國家較爲顯著。基於前述的論點，本文提出下列的假設：

假設一（H1）：從事實面的觀點，倘若一國的經濟中有著較高程度的外資依賴，則有較低的可能會主動地開啓衝突。

假設二（H2）：從法律面的觀點，倘若一國制訂較多的鼓勵外資政策，則有較低的可能會主動地開啓衝突。

假設三（H3）：在鼓勵外資政策中，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對於衝突開啓的促和影響，較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所產生的促和影響，有更顯著且巨大的效果。此效果在開發中國家群體間將會更爲的顯著。

此外，本文的主要關切，在於探索鼓勵外資政策是否隱涵一國有較低的意願來發動衝突的意向。由於鎖定的焦點在於一國的整體意向，特別是檢視一國是否具有在任何情況下皆不願意使用武力的意向。因此，本文的分析層次自然鎖定在國家／單元（state/monadic）的層級。儘管有論者認爲國家間衝突本質上是成對的現象，因而成對層次的分析應較單元層次的分析更爲適當。但基於下列幾點理由，筆者認爲以單元國家所擬訂的假設

[20] 近年來全球外資的來源結構出現巨大的變化。以往外資的流入與流出皆是經由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所主導，該情況隨著近年來新興市場的崛起而出現結構性轉變。根據 UNCTAD 的 2013 年的世界投資報告（UNCTAD, 2013），在 2012 年發展中經濟體首度比已開發經濟體吸引更多的外資流入，共占全球外資流入的 52%。另一方面，發展中經濟體向外的外資流出也較以往出現大幅成長，約達全球外資流出總量的三分之一。其中，中國對外的投資金額在 2012 年總計達 840 億美元，成爲全球第三大外資流出國家，僅次於第一的美國及排名第二的日本。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與分析是合理的且具理論貢獻的：

首先、本文分析的依變項是欲檢視一國是否具有不願意使用武力的意向，並表現於其對外的行爲上。進一步說，本文嘗試分析的焦點是探討外資因素是否能成爲一個具有較低衝突傾向之國家的普遍特徵，而不論該國是面對哪一個衝突對手國的情況下皆能存在。本文雖不否認成對層次分析在理解國家間爭端的重要性，及國家在評估是否主動開啓衝突時，亦會先考量其對手國的強弱（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1992；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但是筆者認爲，運用單元國家層次的分析才能適恰地回答本文所關注的下列問題：即外資因素對於一國在任何情況下是否使用武力的決定，是否具有顯著的箝制及拘束性影響。

第二、由於國家整體的意向是本文分析的重點，解釋變項在操作層面上即必須包括各種不同的鼓勵外資政策，進而確實涵蓋一國之總體的政策偏好與政治意向。舉例而言，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例如穩定的總體經濟或法治發展，將對地主國的所有商業活動產生全面性利益（Olson, 2000；North, 1990）。這些政策所產生的利益不會因不同形式或不同國家來源的跨國企業而給予差別對待。再者，本文利用一國在特定期間所簽訂提倡外資條約的數量作爲一個解釋變項，目的在捕捉該國致力於與其他國家來促進外資流動的全般性努力，而不是爲分析該國針對與特定國家的經貿友好行爲。因此，本文的解釋變項是以無特定方向性，且不具目標國敏感性的途徑進行規劃，這些變項適合在單元國家層級進行分析。

第三、既有文獻中並不乏運用單元層級的國家特質來分析一國的衝突行爲，且發現具有顯著性影響的研究。舉例而言，例如一國的鄰國邊界的數量，即廣泛被認爲是影響一國是否容易捲入國家間衝突的重要國家特質（Richardson, 1960；Starr and Most, 1976；1978；Siverson and Starr, 1990）。再者，許多學者也證明一國的軍事力量的強弱對該國捲入國家間衝突的次數具有關鍵影響（Bremer, 1980；Singer et al., 1972）。此外，一些學者從單元國家的角度分析，發現民主國家具有普遍和平的傾向，也再次喚起國際關係學界對運用單元層級來分析國家間衝突的關注（MacMillan, 2003；Souva and Prins, 2006）。由此可見，以單元國家層次分析國家間衝突的途徑仍具其研究價值與理論重要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伍、檢證模型與變項

鑑於本文是從單元層級進行分析，因此統計模型的分析單位即爲國家—年度。本文研究的資料庫是從各個變項來源之不同統計資料庫彙整而來，整合後的統計資料庫共包含 170 個國家，受到目前本研究運用之各個資料庫涵蓋之不同時間的限制，致使本文現階段研究所涵蓋之時間從 1970 年至 2001 年爲止。俟日後各資料庫如更新後，本研究可再擴充包含之年份，並可進一步探討本研究問題在不同時期之變化。

此外，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資料是時間序列橫斷面資料（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 TSCS data），時間依賴（temporal dependence）將可能對於二分變量的依變項—衝突開啓—造成影響。爲解決此問題，本文使用「和平年份」（peace years）的邏輯模型（logit model），並從該和平年份變項所衍生的一組三次樣條函數（cubic splines）進行統計分析。此種方式是由 Beck、Katz 及 Tucker (1998) 提出，目的在解決前述二分變量的依變項在時間序列橫斷面資料進行統計所可能產生的時間依賴問題。

再者，爲檢視不同的外資因素在發展中國家是否具有更顯著的影響，筆者將以不區分經濟發展程度的所有國家群體及僅包含發展中國家的群體，針對外資與衝突開啓間的關聯分別進行分析。筆者運用世界銀行國家分類，作爲建立此兩群體的依據。該分類是以一國的國民收入作爲評判的標準。發展中國家群體的組成是從所有國家群體中剔除不屬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中之高所得國家而來。[21]

---

[21] 世界銀行收入群組（World Bank income group）是利用一國（或經濟體）每年的人均 GDP 作計算。根據世界銀行網站，其將先前的分類標準以一國每年的人均購買力平價（PPP）GDP 爲基準。在此分類下，共有 25 個 OECD 高收入國家，包括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捷克、丹麥、芬蘭、德國、希臘、匈牙利、愛爾蘭、義大利、日本、南韓、荷蘭、紐西蘭、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及美國。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期刊資料庫

一、依變項—衝突開啓者之內涵與定義

鑒於本文之目的在探索外資因素與一國在國家間爭端中是否會率先使用武力之兩者間的互動關聯，因此本文的重點鎖定在國家是否會主動地使用軍事武力來解決國家間的爭端。在此前提下，依變項需滿足兩項重要的條件：首先、國家必須是衝突開啓者。其次、該國在國家間爭端中必須採取具體的軍事行動。換言之，這個國家是在與他國的爭端中率先使用軍事武力作爲解決手段，而導致與他國的軍事衝突。爲符合此兩項條件，本文從「成對軍事化國家間爭端資料庫」（Dyadic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dataset, MID）（Ghosn and Bennett, 2007）中的既有資料中，另行建立一項名爲「MID 衝突開啓者」的變項（MID conflict initiator variable）。此變項編碼的依據是按照一國在特定一年期間是否於國家間爭端中使用軍事武力（Quackenbush and Rudy, 2009）。[22] 倘若該國在特定年度的國家間爭端中使用武力，則被編碼爲 1（衝突開啓者），若無使用軍事武力，則編碼爲 0。因此，該變項是二分變量的依變項。持平而論，此變項可在重大的國際衝突事件與涵蓋不同嚴重程度的國家間爭端間中，取得較適當的平衡。[23]

二、自變項－外資政策變項與外資依賴變項

爲檢測外資因素是否與衝突開啓存在負相關，筆者利用兩種類型的外資因素來進行統計檢測：即事實面的外資變項，與法律面的外資因素。前者評估是否一國之經濟對外資的依賴會影響其主動開啓衝突的可能性；而

---

22 由於 MID 資料庫中的變項之國家 A 的最高層級的敵意（state A's highest hostile level）包含下列等級：無軍事行動（no militarized action）、行使威脅（to threat）、展示武力（display）、使用武力（use of force）及戰爭（war）。爲與本文所探討的主旨相符，本文僅對此變項中在國家間糾紛的衝突層級達到使用武力或戰爭，才納入計算。

23 兩項理由導致本文不使用在 COW 資料庫中的 COW 戰爭挑起國（COW war initiator）的變項。首先、COW 資料庫是用來記錄重大的國家間戰爭的資料庫，其達到戰爭條件的門檻相對地高（例如其定義的戰場死亡人數需達到超過 1 千人）。因此，在 1970 年後國際間達成此條件的戰爭挑起國的數目相對地少（僅 26 個國家）。其次、COW 戰爭挑起國的變項的涵蓋層面較窄，並未包含足夠的不同衝突等級以進行分析。因此，筆者決定使用 MID 資料庫作爲依變項的資料來源。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者則在分析一國的鼓勵外資政策是否隱含其具有較低衝突意願的傾向。

關於前者，筆者利用一國之外資流入占其 GDP 的比重作爲衡量在特定年度外資流入對於該國經濟的重要性，簡稱爲「外資流入依賴」。至於後者，筆者則將其分爲兩類，包括「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與「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的兩大類型。

更仔細地說，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包含兩個變項：第一是「雙邊投資協定」，該變項是以一國在特定年份簽署此類條約的數量來作爲評估的基準。其次則是「避免雙重課稅協定」，該變項是以一國在特定年度所締結此類條約的數量來評判。此兩項變項的統計資料皆來自於 2007 年版的「世界投資報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UNCTAD, 2007），其涵蓋年份從 1980 年至 2006 年。[24]

另一方面，有鑑於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不僅具有異質性的特色，且包含許多不同的總體經濟面向與制度性的特徵。因此，筆者從兩個資料庫來摘取四種不同的變項，進以涵蓋國家透過提升整體經商環境以吸引外資的多面向努力。首先，前三個變項主要來自「經濟自由度的世界指標」（the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Index, EFW Index）資料庫（Gwartney et al., 2008）。[25] 筆者利用「國際資本市場控制」（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controls）（簡稱資本市場控制）來衡量一國對國際資本市場控制的程度。[26] 此外，

---

[24] 舉例而言，例如美國於 1998 年與莫三比克、立陶宛及玻利維亞簽訂雙邊投資協定，因此該年度美國在此變項的數值即爲 3。又如中國在 1992 年與葡萄牙、西班牙、希臘、烏克蘭、莫道爾、烏茲別克、吉爾吉斯、亞美尼亞、菲律賓、哈薩克、韓國、土庫曼、越南等共 13 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因此該年中國在該變項的數值即爲 13。

[25] 必須注意的是，經濟自由度的全球指標（EFW Index）在 2000 年以前並不是提供年度的資料庫。雖然其涵蓋時間是自 1970 年以後，此資料庫在 2000 年以前是針對每個變項以每 5 年一次的資料爲主。爲彌補此不足，筆者利用統計上慣用的內推法（interpolation）來估計各年度的表現，以補足那些未被記錄的年度資訊。此外，由於本文所運用的這三個變項皆是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相對而言較爲穩定，而較不容易出現大規模巨幅的改變，也因此較爲適合運用內推法來補足遺漏的數據，且不至於出現重大的偏離。

[26] 此變項的內容包含兩大類型：首先是外國所有權／投資限制（foreign ownership/investment restrictions）及國家的資本控制（state's capital control）。這些資料的來源是從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年度出版刊物 *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s* (AREAER) 中取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評估地主國法律特徵在吸引外資上的角色，筆者亦利用「法律結構與財產權的保障」（legal structure and security of property rights）（簡稱爲法律結構與財產權）作爲評估一國在法規制度與財產權上的表現。[27] 最後，本文也將「經濟自由」（economic freedom）作爲檢測地主國之總體經濟環境良窳的指標。[28] 上述三項變項的評分從最差表現的 0 分到最佳表現的 10 分間擺動。舉例而言，美國在 2000 年於經濟自由之指標的數值爲 8.6，而中國在同年則爲 5.7。此資料庫涵蓋的範圍是從 1970 年到 2006 年。

爲避免可能發生的評估誤差，及增加本研究發現的可信度，筆者增加一項評量資本限制的變項來補充前述變項。[29] 此變項是從 Chinn 與 Ito (2008) 所編輯的「金融開放指標」（financial openness index）（簡稱爲 C&I 金融開放）作爲評估金融開放程度是否影響一國主動挑起衝突的機率。此指標是連續性數值的變項，從最低表現的 -1.797522 到最佳表現的 2.539847。此數值越高表示一國對資本帳的控制越少。舉例而言，美國在 2000 年在該指標的數值爲 2.539847，中國於同年則爲 -1.129786。此資料庫涵括從 1970 年到 2006 年的 182 個國家。

三、相關的控制變項的定義與意涵

此外，有關以單元國家層級來進行國家衝突分析的相關文獻，並通常皆將下列的控制變項納入考量：

---

27 此變項包含其下 7 種次指標（sub-indicators）：(1) 司法獨立（judicial independence）；(2)公平的法院（impartial courts）；(3) 財產權保護（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4) 在法治與政治過程中的軍事干預（military interference in rule of law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5) 司法系統的廉潔（integrity of the legal system）；(6) 契約的法律執行（legal enforcement of contracts）及 (7) 實質財產販售的限制規定（regulatory restrictions on the sale of real property）。

28 此變項是下列 5 種總體經濟與制度性類別之總體評價的平均值，這些項目包含：(1) 政府規模（the size of government）；(2) 司法結構與財產權的保障（legal structure and security of property rights），即前述的變項；(3) 取得健全的資金（access to sound money）；(4) 自由地進行國際貿易（freedom to trade internationally）及 (5) 信用、勞工及商業的法規（regulation of credit, labor, and business）。

29 資本市場控制（capital market controls）與 C&I 金融開放（C&I financial openness）兩變項的資料來源皆取自前述之 IMF 的 AREAE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民主（Democracy）：儘管民主已被證明有助於減少在成對國家間衝突的發生（Dixon, 1994；Starr, 1997；Morgan and Campbell, 1991；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1992），但民主因素是否在單元國家層次內仍對降低國家間衝突有影響，仍是一項在學界中持續辯論的議題（Quackenbush and Rudy, 2009）。儘管如此，許多研究提供理論解釋說明，爲何一般而言民主國家相較於其他政權體制仍是較傾向和平（Maoz and Russett, 1993；Rummel, 1995；1997；Huth and Allee, 2002；MacMillan, 1998；2003；Ray, 1995）。再者，不少的研究也以實證證據支持在單元國家層次的民主和平論（Bremer, 1992；Caprioli and Trumbore, 2006；Huth and Allee, 2002；Leeds and Davis, 1999；Oneal and Ray, 1997；Russett and Starr, 2000）。有鑑於此，本文將民主變項納入模型予以控制中。民主變項的資料來源是從「政體四」（Polity IV）資料庫中的「政體二」（Polity 2）變項所取得（Marshall and Jaggers, 2003）。筆者將此變項重新調整爲最低表現的 0（獨裁體制）到最高等級的 20（民主體制）。
2. 國家能力（National Capability）：不可否認，一國是否會主動挑起衝突，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其軍事能力的大小。既有研究指出一國軍事力量的強弱對於其涉入衝突的能力有正向的相關。不同於以往僅是控制一國的軍事支出或軍隊人數來作爲評估一國的軍事能力大小，筆者運用「戰爭相關資料庫」（the COW dataset）中的「國家能力綜合指數」（the 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 CINC Index）（Singer et al., 1972；Singer, 1987）作爲評估一國軍事力量的指標。此指標評估一國在 6 種面向的表現，包含鐵／鋼的製造、都市人口、總人口數、軍事支出、軍隊總人數、及每年在國際體系中能源生產總數量。此變項是一國在前述六項指標的平均表現。
3. 先前衝突經驗（Prior Conflict Experience）：許多不同的因素（例如尚未解決的邊境爭端、歷史的宿敵、或持續軍事對抗等）使得某些在最近曾發生軍事衝突經驗的國家，相較於其他國家更容易再次地捲入衝突。爲將這些容易發生衝突或是有持續性衝突特徵的國家納入考量，本文運用 COW 資料庫中的「國家間戰爭變項」（interstate

臺灣大學學術研究資料庫

war variable）的資料，並將之延遲 1 年（one-year lag）的數據，以將符合前述情況的國家納入控制。因此，該變項爲二分變量的形式。若編爲 1，代表該國在 t-1 年度曾經歷過國家間衝突，編爲 0 則表示該國在該年度並未經歷衝突。

4. 和平年份（Peace Years）：所謂和平年份是指一國從評估年份開始後，到其首次引發衝突所經歷過的時間年份。換言之，倘若一國所經歷的和平時間越長，則代表該國越不容易引發衝突。納入此一個控制變項主要是由於統計方法上的需要。如先前所述，由於必須將時間依賴的影響納入考量。因此本文採取由 Beck、Katz 與 Tucker (1998) 所推薦的統計方法，運用和平年份與其三個三次樣條函數來獲得較爲正確的統計結果。筆者預期此和平年份變項將與衝突開啓呈現負面相關。

陸、實證分析之結果與其意涵

此部分將說明外資因素對於衝突開啓於單元國家層級的影響，並進行兩階段的實證檢視。第一階段將逐次地檢視每項外資因素與一國之衝突開啓的關聯，藉此獲得兩者間的初步關聯。在第二階段，本文聚焦於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與衝突開啓間的聯繫。此階段將包含外資流入依賴與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此兩項因素的影響，並利用邏輯模型逐一分析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變項對於衝突開啓的影響。此外，統計母體 (A) 涵括資料在內的所有國家進行分析，統計母體 (B) 則鎖定發展中國家，藉此以瞭解外資因素是否在不同統計母體中對衝突開啓有相異的影響。

表 2 與表 3 爲前述外資因素與衝突開啓在第一階段的統計分析結果。統計結果顯示，假設 (一) 獲得統計顯著性的證據支持，但是假設 (二) 則沒有獲得統計支持。詳言之，除兩個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變項外，無論是在統計母體 (A) 的所有國家、或是統計母體 (B) 的發展中國家，所有外資變項的係數皆與衝突開啓呈現負面關聯，且在不同的信心程度上呈現統計顯著性。因此，根據此初步統計結果，本文發現有較高程度的外資依賴、或是在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上表現較好的國家，有較低的可能來主動開啓衝突。

國家・學術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但另一方面，本文也發現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則不具備此類似的促和效果。

更進一步分析，外資流入依賴變項之係數在模型(一)的兩個檢測母體群中皆是呈現負相關，且具統計顯著性。這些發現支持假設(一)的說法，即是一國如果有較高程度的外資流入依賴，則較有較低可能會主動引發衝突。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這些變項的係數，在統計母體是所有國家時所出現的數值，皆大於渠等在統計母體是發展中國家的數值。此結果意謂一國的外資流入依賴對衝突開啓的促和效果，更趨近是一項普遍的現象，而非只是限定於開發中國家。

表 2　事實面的外資因素對於衝突開啓的影響（logit 模型）

變　　項	模型一 A	模型一 B	模型二 A	模型二 B	模型三 A	模型三 B
外資流入依賴 (t-1)	-2.893** (1.407)	-2.519* (1.498)				
雙邊投資協定 (t-1)			.0014 (.027)	.0032 (.031)		
避免雙重課稅協定(t-1)					.0008 (.035)	.0003 (.046)
民主(t-1)	-.014** (.007)	-.002 (.008)	-.011 (.008)	-.004 (.010)	-.012 (.008)	-.005 (.010)
國家能力 (t-1)	1.234*** (.206)	1.180*** (.383)	13.991*** (2.228)	11.931*** (2.779)	13.731*** (2.317)	11.569*** (2.846)
先前衝突經驗 (t-1)	1.026*** (.261)	.969*** (.272)	2.163*** (.386)	2.177*** (.423)	1.850*** (.434)	1.789*** (.488)
和平年份	-.723*** (.105)	-.715*** (.114)	-.511*** (.120)	-.576*** (.132)	-.510*** (.126)	-.560*** (.142)
Spline 1	.065*** (.017)	.059*** (.018)	.038** (.019)	.042** (.021)	.037* (.020)	.037 (.023)
Spline 2	-.0025*** (.0009)	-.0020** (.0010)	-.0013 (.0010)	-.0013 (.0011)	-.0012 (.0011)	-.0008 (.0013)
Spline 3	.00003** (.00001)	.00002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2)	4.82e-06 (.00002)
Constant	-.128 (.169)	-.157 (.183)	-.546*** (.198)	-.450** (.212)	-.513** (.206)	-.420* (.223)
Log-likelihood	-1282.81	-1078.29	-929.70	-772.13	-859.95	-701.53
Pseudo R2	0.147	0.137	0.167	0.160	0.154	0.145
N	4109	3414	2986	2488	2636	2138

註：括號內爲標準差。P-values 以單尾檢定。*$p \leq .10$, **$p \leq .05$, ***$p \leq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結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3　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變項對衝突開啓的影響（logit 模型）

變　　項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A	B	A	B	A	B	A	B
資本市場控制 (t-1)	-.047**	-.076**						
	(.023)	(.031)						
法律結構與財產權 (t-1)			-.114***	-.138**				
			(.041)	(.054)				
經濟自由 (t-1)					-.233***	-.321***		
					(.058)	(.072)		
C&I 金融開放 (t-1)							-.101**	-.139***
							(.040)	(.049)
民主 (t-1)	-.006	.005	-.007	.006	-.002	.008	-.012	-.004
	(.008)	(.009)	(.009)	(.010)	(.009)	(.010)	(.007)	(.008)
國家能力 (t-1)	16.882***	15.750***	17.816***	17.190***	17.800***	14.488***	17.937***	17.477***
	(2.166)	(3.002)	(2.488)	(3.847)	(2.324)	(3.421)	(2.298)	(3.362)
先前衝突經驗 (t-1)	1.104***	.846**	1.489***	1.289***	1.339***	1.083**	1.449***	1.355***
	(.373)	(.410)	(.425)	(.474)	(.405)	(.447)	(.293)	(.309)
和平年份	-.637***	-.625***	-.560***	-.532***	-.521***	-.483***	-.585***	-.575***
	(.118)	(.132)	(.126)	(.142)	(.124)	(.140)	(.111)	(.122)
Spline 1	.056***	.049**	.049**	.040*	.042**	.032	.048***	.041**
	(.019)	(.021)	(.020)	(.023)	(.020)	(.022)	(.018)	(.020)
Spline 2	-.0021**	-.0016	-.0019*	-.0013	-.0016	-.0009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Spline 3	.00003*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8.90e-06	.00002	.00001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00001)	(.00001)
Constant	-.412	-.406	.002	.006	.595*	.958**	-.478***	-.514***
	(.199)	(.222)	(.259)	(.320)	(.338)	(.411)	(.184)	(.199)
Log-likelihood	-1015.14	-809.82	-856.60	-654.53	-883.60	-681.17	-1137.30	-940.62
Pseudo R2	0.152	0.138	0.154	0.136	0.158	0.143	0.172	0.166
N	3329	2603	2634	1933	2762	2068	3677	3042

註：括號內爲標準差。P-values 以單尾檢定。*$p \leq .10$, **$p \leq .05$, ***$p \leq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結果

其次，包含雙邊投資協定及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在內的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變項，在兩個統計母體中皆呈現正相關，但卻未具統計顯著性。此結果顯示，假設(二)的論點無法獲得統計證據的支持，也意味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並未對衝突開啓具有統計顯著性的促和影響。

再者，表 3 的統計結果指出，四項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變項之係數皆一致呈現負相關，且具統計顯著性。此結果支持假設(二)的論點，也即是倘若一國制訂越多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則該國較不可能主動發動衝突。相較於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變項，上述的統計結果顯示，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在兩個統計母體中皆對依變項有促和的效果，如同先前所預測。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開發中國家群體中的鼓勵外資總體政策之係數，皆大於那些在所有國家群體中的係數值。此結果顯示，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對衝突開啓的促和影響，於開發中國家群體中更爲普遍與顯著。

另外，就控制變項的部分，除了模型(一)統計母體 A 以外，民主變項的係數在兩類國家母體所呈現的結果並非全部是負相關，且皆沒有統計顯著性。此統計證據顯示，就單元國家層面觀之，民主變項並非是影響一國衝突開啓的關鍵因素。此結果也對 Souva、Prins (2006)的研究所主張之民主對於國家間爭端開啓具有促和影響的論點形成挑戰。

其他三個控制變項（國家能力、先前衝突經驗及和平年份）的係數皆呈現統計顯著性，且這些變項的係數與衝突開啓的相關性皆符合原先的預期。也即是，倘若一國有先前的衝突經驗、或有較大的國家能力，則越容易主動發起衝突。相反地，倘若一國維持較長的和平年份，則將降低其主動引起衝突的可能性。

在第二階段，不同面向的外資因素將同時納入分析中，並將逐一檢測每項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變項對衝突開啓的可能影響。這是因爲在實際上，不同的外資因素較可能是同時對衝突開啓產生影響，因此應同時將這些變項納入考量。

歸納表 4 的統計結果爲下列幾點：首先、如同先前的統計結果，外資流入依賴的係數在表 4 的所有模型中皆是一致呈現統計顯著性的負相關。此結果支持假設 (一) 的論點。其次、表 4 的統計結果部分支持假設 (二) 的論點，這是因爲儘管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變項一致對衝突開啓呈現不具統計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庫

顯著性的影響，但是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變項卻對衝突開啓具有明顯促和效果。第三、統計結果亦支持假設(三)的論點，因爲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確實是在發展中國家群體中呈現統計顯著性，但是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變項在兩個不同統計母體中卻皆未對衝突開啓呈現任何明顯的促和效果。

詳言之，事實面的外資變項（即外資流入依賴）之係數，持續在表 4 的所有模型中呈現與衝突開啓有著不同信心水準的負相關。此外，三個經濟自由度指標的變項對衝突開啓的影響，統計結果顯示（模型八至十），一國的外資流入依賴對降低衝突開啓的機會，在不同的統計母體皆具有統計顯著性且明顯的影響（$p \leq 0.01$）。然而，當評估外資流入依賴變項與 Chinn-Ito 金融開放變項一併納入考量時，統計結果則出現外資流入依賴變項的係數之信心水準下降（在 $p \leq 0.05$ 或 $p \leq 0.1$ 間）。除此差異外，整體上統計結果一致地呈現對假設(一)的支持。

其次，統計結果也發現，雙邊投資協定與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係數並未在任何模型中呈現統計顯著性。換言之，此結果並不支持假設(二)的論點，即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對衝突開啓具有促和的效果。此外，統計結果顯示，雙邊投資協定的係數在所有模型中皆與衝突開啓呈現正面的相關，但避免雙重課稅協定，除了在模型(十一)統計母體 A 與 B 以外，在大部分的模型中皆與衝突開啓呈現負相關。總言之，統計結果顯示，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變項並未對降低衝突開啓的可能性產生具統計顯著性的影響。

儘管在第一階段的分析一致地指出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變項對衝突開啓具有促和影響，但表 3 的統計結果則顯示，不同面向的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對衝突開啓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歸結而言，所有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變項，除在模型 (九) 統計母體 A 之外，皆一致在不同信心水準區間中呈現統計顯著性的負相關。此外，統計結果也顯示，資本市場控制變項對衝突開啓的促和效果在模型 (八) 的兩個統計母體中（A 與 B）皆呈現統計顯著性。此變項對所有國家群體與發展中國家群體分別降低 5.1% 與 8.4% 的衝突開啓之可能。此外，Chinn 與 Ito 金融開放變項之係數亦在相同信心水準下呈現對衝突開啓的負相關，如模型 (十一) 統計母體 A 與 B 所示，且對所有國家群體與開發中國家群體具有分別降低 8.5% 與 10.9% 的衝突開啓之可能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4　外資因素對衝突開啓的影響（logit 模型）

變　　項	模型八		模型九		模型十		模型十一	
	A	B	A	B	A	B	A	B
外資流入依賴 (t-1)	-10.212***	-11.808***	-10.782***	-13.313***	-9.662***	-11.023***	-3.221**	-3.023*
	(3.625)	(4.433)	(3.728)	(4.574)	(3.657)	(4.516)	(1.639)	(1.757)
雙邊投資協定 (t-1)	.016	.038	.016	.035	.025	.054	.009	.011
	(.032)	(.039)	(.033)	(.041)	(.032)	(.040)	(.033)	(.041)
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t-1)	-.020	-.067	-.021	-.063	-.011	-.051	.021	.019
	(.041)	(.061)	(.043)	(.064)	(.041)	(.061)	(.043)	(.062)
資本市場控制 (t-1)	-.052*	-.087**						
	(.028)	(.040)						
法律結構及財產權 (t-1)			-.082	-.144**				
			(.051)	(.069)				
經濟自由 (t-1)					-.176**	-.283***		
					(.069)	(.087)		
C&I 金融開放 (t-1)							-.087*	-.114*
							(.047)	(.059)
民主 (t-1)	.006	.013	.003	.012	.008	.014	-.003	.001
	(.011)	(.012)	(.011)	(.012)	(.011)	(.012)	(.009)	(.011)
國家能力 (t-1)	17.366***	17.355***	18.902***	20.868***	17.330***	15.916***	17.437***	16.927***
	(2.859)	(3.996)	(3.132)	(4.606)	(2.850)	(4.013)	(3.066)	(4.616)
先前衝突經驗 (t-1)	1.851***	1.735***	1.750***	1.584***	1.803***	1.656***	1.819***	1.766***
	(.474)	(.545)	(.473)	(.550)	(.477)	(.554)	(.446)	(.509)
和平年份	-.460***	-.520***	-.456***	-.503***	-.471***	-.525***	-.405***	-.448***
	(.142)	(.165)	(.144)	(.168)	(.143)	(.167)	(.138)	(.157)
Spline 1	.032	.033	.035	.033	.036	.036	.024	.022
	(.022)	(.026)	(.023)	(.027)	(.023)	(.027)	(.022)	(.025)
Spline 2	-.0010	-.0006	-.0012	-.0007	-.0013	-.0008	-.0007	-.0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Spline 3	.00001	1.67e-06	.00001	2.35e-06	.00001	4.78e-06	9.07e-06	-3.49e-06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Constant	-.535	-.383	-.222	.101	.266	.882*	-.722***	-.659***
	(.250)	(.280)	(.306)	(.385)	(.397)	(.492)	(.235)	(.256)
Log-likelihood	-658.25	-501.69	-644.45	-487.77	-645.39	-487.93	-718.42	-567.10
Pseudo R2	0.172	0.164	0.166	0.158	0.170	0.163	0.173	0.165
N	2025	1542	1927	1449	1955	1474	2212	17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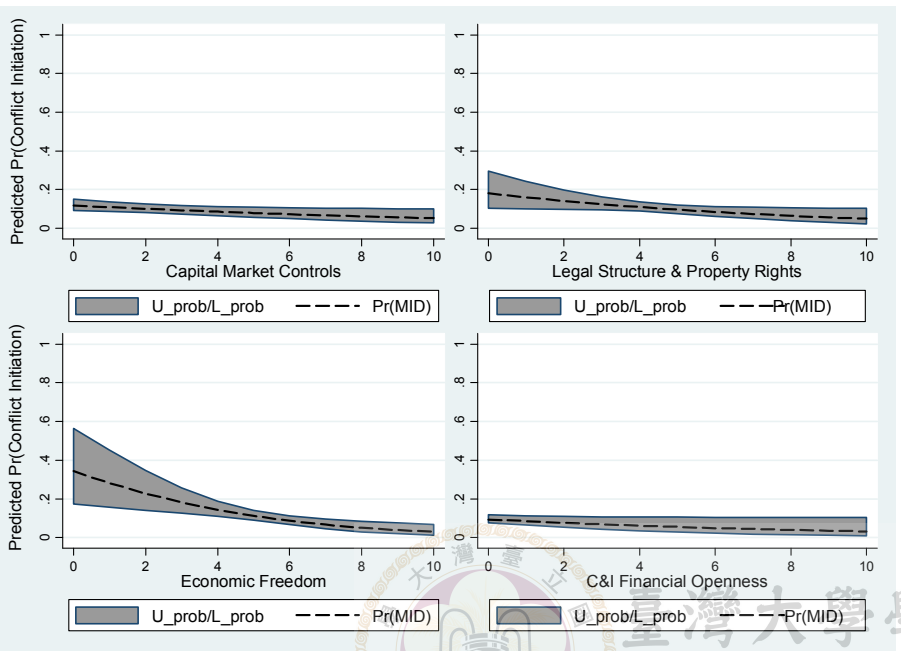
註：括號內爲標準差。P-values 以單尾檢定。*$p \le .10$, **$p \le .05$, ***$p \le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結果

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 學術期刊專庫

再者，統計結果顯示，法律結構與財產權變項的係數在發展中國家群體呈現具統計顯著性 ($p \leq 0.5$) 的負相關，但在所有國家群體中卻不具統計顯著性。此結果指出，法律結構與財產權變項對假設 (二) 僅獲得部分的支持，也意味此變項對於衝突開啓的促和效果在發展中國家較爲顯著，意謂倘若發展中國家強化其法律制度與財產權保障，則將降低其衝突開啓的可能性。

最後，統計結果指出，經濟自由變項在兩個統計母體中皆一致呈現對衝突開啓具有統計顯著性的負相關。經濟自由在所有國家群體與開發中國家群體分別具有降低 16.3% 與 24.7% 的衝突開啓之可能性的促和效果。再者，此變項在發展中國家群體所呈現的係數皆大於其在所有國家群體的係數，這意謂有著較佳整體經濟環境的發展中國家，則有較低的機會來主動引發衝突。另外，在控制變項方面，相似於第一階段時的統計結果，民主變項並未對衝突開啓具有統計顯著性的影響，而其他的控制變項則一致地在高度信心水準條件下，呈現與本文原先預期相同的統計結果。

圖 4　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在發展中國家群體對衝突開啓的預期或然率



註：虛線代表衝突開啓的或然率。陰影部份是 95%的信心區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結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4 呈現的是，在控制其他共變量（covariates）於平均數或中位數時，不同面向的鼓勵外資總體政策變項在開發中國家群體中所呈現對於發生衝突開啓事件的預期或然率。如同假設所預期，隨著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之強度增加，發生衝突開啓的預期或然率也隨之而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四項變項中，在經濟自由變項的影響下，衝突開啓的預期或然率呈現下降的幅度最大。此結果透露出經濟自由的提升，相較於其他變項，對於降低衝突開啓之可能有具更爲顯著的效果。表 5 呈現在前述四個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變項下，衝突開啓之發生的或然率大小。統計分析結果一致地顯示，這些變項在開發中國家中對於衝突開啓的促和效果遠大於渠等在所有國家中的表現。因此，此結果顯示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傾向於對開發中國家的衝突開啓更具有拘束力。

表 5　發生衝突開啓的預期或然率

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	預期或然率所有國家群體（次模型 A）	預期或然率發展中國家群體（次模型 B）
資本市場控制	-5.1%	-8.4%
法律結構與財產權	-8.0%	-13.5%
經濟自由	-16.3%	-24.7%
C&I 金融開放	-8.5%	-10.9%

資料來源：本研究結果

總之，前述分析總結出一項總體趨勢，即在發展中國家群體中，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與衝突開啓呈現負相關。然而，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在任何一個統計母體中皆未對衝突開啓具有統計顯著性的影響。因此，統計結果支持假設 (三) 的論點，也即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相較於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更可能與較低衝突傾向的國家相關。有鑒於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之進展多涉及一國根本性的制度性變革，例如私有財產權的鞏固或法治成效的良窳，而需要付出更大的政治決心與政策作爲，因而可解釋爲何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相較於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對降低衝突開啓之可能具有更明顯的促和效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柒、結論

在近來國際關係的研究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意向與其軍事行爲的關聯一直是引發眾多討論的議題。本文試圖針對鼓勵外資政策與國家的對外軍事行爲，探討兩者理論上的聯結，以爲此一遭到遺漏且未被探討的重要議題提供解釋。此外，在進行實證分析後，本文獲得統計證據支持下列論點，即國家制訂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與該國有著較低衝突開啓之可能，呈現正向的關聯。簡言之，本文的重要發現可從下列四點說明。

首先，本研究證實，越依賴外資流入的國家，渠主動發動軍事衝突的機會也越低。此結果不僅支持既有的機會成本論述，亦符合先前的研究發現在成對國家間，外資將增加兩國間和平前景的看法（Rosecrance and Thompson, 2003；Polachek and Seiglie, 2005；Polachek et al., 2007）。此外，透過分析外資流入依賴在單元國家層級的促和影響，本文的發現除更強化先前的研究成果，證明外資是和平的力量外，也進一步證實，從單元國家的觀點而言，機會成本仍然是國家在思考是否使用軍事手段及挑起衝突時一項重要的因素（Souva and Prins, 2006）。

其次，至目前爲止，幾乎所有的既有研究皆是將焦點鎖定在事實面的經濟活動對國家間衝突的影響，但本文超越現有的思考框架，而主張法律制度面的外資因素，例如鼓勵外資政策，才是顯示國家之低衝突意向的可信指標。這不僅是因爲鼓勵外資政策與衝突開啓在本質上是兩者無法並立的，更是因爲在軍事衝突的陰影下，將導致鼓勵外資政策蒙受不被投資者信賴的風險。

換言之，倘若一國致力於制訂鼓勵外資政策以吸引外資，該國必定在一開始即不願意主動引發衝突。本文的統計結果支持前述論點，並指出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對於一國的衝突開啓具有統計顯著性的促和效果。這也意味著，若一國制訂獎勵外資政策是有關該國總體經濟環境與制度性結構的改善，並試圖透過這些作爲來營造一個有利的投資氣候，則我們可預期這些鼓勵外資政策將對該國在國際爭端中採取先發制人的軍事行爲造成顯著的拘束與限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某程度上，此結果類似民主制度有助於降低國家間衝突前景的論點（Bueno de Mesquita et al., 1999；2003），但兩者卻是基於不同的原因。清楚地說，本文發現指出，就單元國家層級而言，具有制度特徵之鼓勵外資的總體政策，相較於民主變項，在降低衝突開啓的可能性上會扮演更爲重要的角色，此也證明制度因素就一國是否能維持其和平環境與經濟發展，有著關鍵性的影響（North, 1990；North et al., 2000）。

第三、儘管先前研究指出雙邊經濟條約與國家間衝突是呈現負相關（Mansfield and Pevehouse, 2000；Mansfield et al., 1999-2000；2000），但本研究並未發現提倡外資的條約政策對一國挑起衝突之機會有負面的影響。本文對此提出兩點解釋。首先，在本文進行分析的單元國家層級中，國家簽署之外資協約的促和效果，未能具備足夠而廣泛的拘束力來致使該國放棄對非締約國的所有其他國家採行軍事行動。再者，已簽署之鼓勵外資協定的實際落實亦可能影響這些政策的促和效果。某些情況下，簽署的提倡外資之條約經常變成是「廉價空話」（cheap talks）而並未被締約國眞正付諸實行，致使這些提倡外資條約未對衝突開啓具有明顯的拘束力。此一發現除顯示未來必須從成對國家的分析層次上，探討提倡外資條約對衝突的影響，也意味獎勵外資政策對於國家間衝突的拘束作用，大多是來自於國家致力於制度性結構與總體經濟條件之改善的政策作爲，而非僅是該國簽署多少數量的吸引外資之相關條約。

最後，本文試圖重新喚起國關學界對國家經濟政策方向與國家對外軍事行爲之關聯的重視。如同先前所述，一國的經濟政策若從閉關自守、自給自足及政府主導的統制經濟模式，轉變爲對外開放、自由放任、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通常在該國外交政策上也會出現調整的現象，而使其在對外政策上變得越趨溫和與不具侵略性。本文研究發現，外資因素與衝突開啓間之關聯所透露的，不僅是國家對使用軍事手段以解決爭端之機會成本的計算，更是國家主觀意向的顯現，也即是該國是否願意在行爲上與心態上採取開放的態度，來面對外資流入所可能伴隨而來的機會與風險，並進而在對外爭端之運用軍事手段的作爲上採取更爲自制的作法。

總之，國家透過其經濟政策方向的轉換，也隱含該國在心態上的轉變。此轉變也透露出一些可信的跡象顯示該國有意維持和平，且不願輕啓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端。鼓勵外資政策正是其中的一項可信的訊號。本文對於外資政策與衝突開啓的理論連結與實證分析，不僅對軍事行動與經濟活動之關聯的研究提供進一步的支持（Biglaiser and DeRouen, 2007；DeRouen, 1995；Pollins, 1989），亦對學界在有關國家經濟政策與軍事行爲之互動的理論探討與實證研究往前邁進了一步。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邱奕宏，2013，〈軍事衝突、政治風險與外來直接投資〉，《問題與研究》，52(1): 35-66。

二、英文部分

Apodaca, Clair. 2002.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Measuring the Impact on Human Rights Standards.” *Asian Survey* 42(6): 883-905.

Baer, Werner and William Miles. 2001.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Its Changing N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Baldwin, David. 1980. “Interdependence and Power: A Conceptu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4(4): 471-506.

Barbieri, Katherine. 2002. *The Liberal Illusion: Does Trade Promote Peac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eck, Nathaniel, Jonathan Katz, and Richard Tucker. 1998. “Taking Time Seriously: Time-Series-Cross-Section Analysis with a Binary Dependent Variabl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4): 1260-1288.

Biglaiser, Glen and Karl DeRouen, Jr. 2007. “Following the Flag: Troop Deployment and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1: 835-854.

Blanton, Shannon Lindsey and Robert G. Blanton. 2007. “What Attracts Foreign Investors? *Journal of Politics* 69(1): 143-155.

Bovt, Georgy. 2014. “The High Price of Crimea.” in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opinion/article/the-high-price-of-crimea/497763.html. Latest update 30 June 2000.

Bremer, Stuart. 1980. “N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War Proneness.” In *The Correlates of War II: Testing Some Realpolitik Models*, ed. David J. Sing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57-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remer, Stuart. 1992. “Dangerous Dyads: Conditions Affecting the Likelihood of Interstate War, 1816-1965.”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6(2): 309-341.

Brooks, Stephen G. 1999.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he Changing Benefits of Conques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3(5): 646-670.

Brooks, Stephen G. 2005. *Producing Securit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Calculus of Confli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lastair Smith,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James D. Morrow. 2003.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nd David Lalman. 1992. *War and Reas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James D. Morrow,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Alastair Smith. 1999. “An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4): 791-807.

Caprioli, Mary and Peter F. Trumbore. 2006. “First use of violent force in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1980-2001.”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3(6): 741-749.

Chinn, Menzie and Hiro Ito. 2008. “A New Measure of Financial Opennes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10(3): 309-322.

de Soysa, Indra. 2003.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ssessing Contours, Correlates, and Concomitants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DeRouen, Karl. 1995. “The Indirect Link: Politics, the Economy, and the Use of For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9: 671-695.

Dicken, Peter. 2003.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Dixon, William. 1994. “Democracy and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1): 14-32.

Firebaugh, Glenn. 1992. “Growth Effect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05-130.

Freeman, Nick J. 2002.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ambodia, Laos and Vietna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ambodia, August 16-17, Laos and Vietnam, Hanoi.

Gartzke, Erik. 2003.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Just Lucky: A Few Thoughts about Interdependence and Peace.” I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 eds. Edward D. Mansfield and Brian M. Polli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96-110.

Ghosn, Faten and Scott Bennett. 2007. *Codebook for the Dyadic Militarize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terstate Dispute Data, Version 3.10. Pittsburgh: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Gwartney, James, Robert Lawson, and Seth Norton. 2008.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08 Annual Report*. Vancouver: The Fraser Institute.

Hafner-Burton, Emilie M. 2005. "Trading Human Rights: How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Influence Government Repres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2): 593-629.

Haggard, Stephan and Robert R. Kaufman.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uth, Paul K. and Tidd L. Allee. 2002. *The Democracy Peace and Territorial 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ones, Geoffrey. 1996.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Kelly, Lidia and Jeff Mason. 2014. "Economic Cost of Crimea Annexation Mounts For Russia." in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3/26/crimea-annexation-economic-costs_n_5034085.html. Latest update 30 June 2000.

Kennedy, Charles R. 1987. *Political Risk Management*.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Inc.

Kobrin, Stephen J. 1982. *Managing Political Risk Assess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orten, David C. 2001.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Bloomfield: Kumarian Press.

Kosack, Stephen and Jennifer Tobin. 2006. "Funding Self-Sustaining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Aid, FDI and Government in Economic Suc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0: 205-243.

Leeds, Brett Ashley and David R. Davis. 1999. "Beneath the surface: Regime Typ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1953-78."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6(1): 5-21.

Liberman, Peter. 1996. "Trading with the Enemy: Security and Relative Economic Gai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1): 147-175.

London, Bruce and Bruce Williams. 1988.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Penetration, Protest, and Basic Needs Provision in Noncore Nations: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66: 747-773.

MacMillan, John. 1998. *On Liberal Peace*. London: Tauris.

MacMillan, John. 2003. "Beyond the Separate Democratic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0(2): 233-243.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on C. Pevehouse. 2000. "Trade Blocs, Trade Flow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4): 775-808.

Mansfield, Edward D., Jon C. Pevehouse, and David Bearce. 1999-2000.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and Military Disputes." *Security Studies* 9: 92-11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nsfield, Edward D., Jon C. Pevehouse, and David Bearce. 2000.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 and Military Disputes." In *Power and the Purse: Economic Statecraft, Inter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eds. Jean-Marc F. Blanchard, Edward D. Mansfield, and Norrin M. Ripsman. 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 92-118.

Maoz, Zeev and Bruce Russett. 1993.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3): 624-38.

Marshall, Monty G. and Keith Jaggers. 2003. *The 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03*. College Par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Moran, Theodore H. 1999.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New Policy Agenda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oran, Theodore H. 2002. *Beyond Sweatshop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lob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Moran, Theodore H. 2006. *Harness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 Development: Policies for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Morgan, T. Clifton and Sally Howard Campbell. 1991. "Domestic Structure, Decisional Constraints, and War: So Why Kant Democracies Figh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5(2): 187-211.

Most, Benjamin A. and Harvey Starr. 1989. *Inquiry, Log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lumbia: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Naughton, Barry. 2007.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ouglass C., William Summerhill, and Barry R. Weingast. 2000. "Order, Disorder, and Economic Change: Latin America versus North America." In *Governing for Prosperity*, eds.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Hilton L. Roo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7-58.

Olson, Mancur. 2000.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Oman, Charles. 2000. *Policy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Study of Competition among Governments to Attract FDI*. Paris: OECD.

Oneal, John R. and Bruce Russett. 1997.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198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1(2): 267-29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neal, John R. and Bruce Russett. 1999. “Assessing the Liberal Peace with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Trade Still Reduces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6(4): 423-442.

Oneal, John R. and James Lee Ray. 1997. “New Test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Controlling fo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1950-1985.”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0(4): 751-775.

Oneal, John R., Frances H. Oneal, Zeev Maoz, and Bruce M. Russett. 1996. “The Liberal Peace: Interdependence,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950-1985.”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3: 11-28.

Oxelheim, Lars. 1993.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Movements.” In *The Global Race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spects and Future*, ed. Lars Oxelheim. Berlin: Springer-Verlag, 11-49.

Polachek, Solomon W. and Carlos Seiglie. 2005.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an FDI Increase Peace?* Newark: Rutgers University Newark.

Polachek, Solomon and Jun Xiang. 2010. “How Opportunity Costs De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War in an Incomplete Information Ga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4: 133-144.

Polachek, Solomon, Carlos Seiglie, and Jun Xiang. 2007.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Defense and Peace Economics* 18(5): 415-429.

Political Risk Services, Inc. 2000. *Political Risk Services Yearbook*. New York: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Pollins, Brian P. 1989. “Conflict, Cooperation, and Commer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 731-761.

Quackenbush, Stephen L. and Michael Rudy. 2009. “Evaluating the Monadic Democratic Peac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6(3): 268-285.

Ray, James Lee. 1995.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 Evalu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Propos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Reuveny, Rafael and Heejoon Kang. 1998. “Bilater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operation: Do Goods Matte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5(5): 581-602.

Richardson, Lewis F. 1960. *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 Pittsburgh: Boxwood Press.

Robison, Richard. 1986. *Indonesia: the Rise of Capital*. North Sydney: Allen & Unwin Pty Ltd.

Rosecrance, Richard N. 1986.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Rosecrance, Richard and Peter Thompson. 2003.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Securit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6: 377-398.

Rummel, Rudolph J. 1995. “Democracy Are Less Warlike than Other Regim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 457-79.

Rummel, Rudolph J. 1997. *Power Kills: Democracy as a Method of Non-Violenc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Russett, Bruce and Harvey Starr. 2000. "From Democratic Peace to Kantian Peace: Democracy and Conflic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II*, ed. Manus I. Midlarsk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93-128.

Russett, Bruce and John R. Oneal. 2001.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Saari, David J. 1999. *Global Corporations and Sovereign Nations: Collision or Cooperation*? Westport: Quorum Books.

Singer, J. David, Stuart Bremer, and John Stuckey. 1972.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In *Peace, War, and Numbers*, ed. Bruce Russett. Beverly Hills: Sage, 19-48.

Singer, J. David. 1987. "Reconstructing the Correlates of War Dataset on Material Capabilities of States, 1816-1985."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14: 115-32.

Singer, Max and Aaron Wildavsky. 1996. *The Real World Order: Zones of Peace/Zones of Turmoil* Chatham: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Inc.

Siverson, Randolph M. and Harvey Starr. 1990. "Opportunity, Willingness, and the Diffusion of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1): 47-67.

Souva, Mark and Brandon Prins. 2006. "The Liberal Peace Revisited: The Role of Democracy,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in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Initiation, 1950-1999."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2(2): 183-200.

Starr, Harvey and Benjamin Most. 1976. "The Substance and Study of Bord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 581-620.

Starr, Harvey and Benjamin Most. 1978. "A Return Journey: Richardson, 'Frontiers' and Wars in the 1946-1965 Er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2: 441-467.

Starr, Harvey. 1997. "Democracy and Integration: Why Democracies Don't Fight Each Othe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4: 153-162.

Stopford, John M. and Susan Strange. 1991. *Rival States, Rival Firms: Competition for World Market Sha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NCTAD. 1992.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s Engines of Growth*.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UNCTAD. 1996.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6: Investment,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Arrangements*.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UNCTAD. 2003.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3: FDI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臺灣大學學術出版資料庫

Nations.
UNCTAD. 2007.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7: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UNCTAD. 2013.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UNCTADSTAT. 2014. "Data Center." in http://unctadstat.unctad.org/EN. Latest update 30 June 2000.
Vernon, Raymond. 1971. *Sovereignty at Bay: 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 New York: Basic Books.
Williamson, John. 1990.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ed. John Williamson.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20.
Yergin, Daniel and Joseph Stanislaw. 2002.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Touchston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alysi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motion Policy and Interstate Militarized Conflict (1970-2001)*

*Eric Yi-hung Chiou***

Abstract

Are states with pro-FDI policies less conflict-prone? This paper examines plausible linkages between a state's FDI promotion policy and its desire to initiate conflicts. By focusing on the willingness of the state, I argue that pro-FDI policy may reveal the state's propensity to preserve peace for two reasons. First, pro-FDI policy is incompatible with conflict initiation sinc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latter offset the state's efforts to increase FDI inflow by the former. Second, pro-FDI policy tends to be credible when it explicitly addresses the state's commitments to multinationals. Hence, states undertaking pro-FDI policies are less likely to initiate conflict in general. By employing various pro-FDI policy indicators, I test the FDI-conflict initiation relationship at the monadic level from 1970 to 2001.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 that while macro-pro-FDI policies a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nflict initiation, treaty-pro-FDI policies do not have the same effect. At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evels, this study adv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DI-conflict relationship by demonstrating the possible pacifying effects that pro-FDI policy might have on conflict initiation, and reveals that states with pro-FDI policy tend to be less conflict-prone.

Keywords: Pro-FDI Policy, Interstate Confli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Conflict Initiation

---

* DOI:10.6166/TJPS.64(45-84)

** Assistant Professor, Specializ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E-mail: chiouyihung@nc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